

# 和運史話



新中國報社出版

教

新中國叢書

第一種

和運史話

新中國出版社編印

民國卅二年七月十六日



## 編序

目前，和平運動雖正在向康莊大道上邁進，但它原是從苦難荆棘中生長起來的。在這過程之中，有許多可歌可泣彌足珍貴的祕密史實，爲目前一般報章所不及記，將來官方史籍所不及傳，而確成爲使和平運動從苦難荆棘到康莊大道之重要因素者，特經本社多方搜集，編譯成輯。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爲親身忠誠協助汪先生自河內脫險之東京日日新聞社特派記者森本泰真夫所撰，原載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之該報。

「汪先生苦難回憶錄」，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險記及「和平運動的長成」等三篇，自成一系統，爲中日間交涉之珍貴而祕密之史料。由東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記述，原載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之該報。「中日交涉祕史的插曲」，則原載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每日新聞。

周佛海先生於一九四〇年冬在東京時，曾向日日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臚述和平運動之前後經過，其中頗多爲世人所不及知者，惜由該報發表時，與原談話記錄者有所出入，故本書中暫不輯入，這是非常遺憾的。待將來經周先生親自修正後，當於再版時補入。

汪精衛先生的「舉一個例」，周佛海先生的「回顧與前瞻」，李聖五先生的「揮淚辭商務」，均爲和平運動過程中之珍貴史料，特一併輯入本書，俾成完璧。

## 和運史話 實價五元

詳述和運經過之秘密史實，爲報章刊物所未見者，都五萬言。

## 歐洲七大秘密 實價八元

法國名作家洛曼斯作。揭發國際政治內幕，祕密外交活動，此次世界大戰之導源。

## 上海衆生相 實價七元

集上海黑暗面之大成，描寫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之各種陰暗而活動。

## 中國內幕

大膽揭破我國政治上的種種祕聞，以及軍政人物的珍聞軼事，莫不搜羅俱備。

- 一集 實價八元
- 二集 實價十元
- 三集 實價十二元
- 四集 實價十元

## 歐戰現地報告 實價十二元

此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之國際人物描寫，歐洲戰地現象及戰術納評述，爲最珍貴之現代史料。

## 大東亞戰爭的勝利 實價十二元

日英美太平洋戰爭實錄，南洋地方風土人情之描述，是一部新鮮生動之報告文學。

## 勝利的記錄 實價十元

最近日英美在太平洋上之大戰，以及在緬甸，南洋各島上之戰況，陸海空潛艇諸戰役，大都是目擊的記載，驚心動魄。

## 時局人物 實價十元

此次世界大戰中，參預之風雲人物，或則爲政治領袖，或則爲一代名將，或則爲財閥，在幕後操縱，或或則在外交上活動。此書不獨可作名人傳記讀，亦可藉之了解國際政治狀態及當前戰爭之內幕實況。

# 和 運 史 話 目 錄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	(一)
汪先生苦難回憶錄·····	(一七)
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險記·····	(二一)
和平運動的長成·····	(二五)
中日交涉祕史的插曲·····	(三一)
汪精衛先生：舉一個例·····	(三三)
周佛海先生：回憶與前瞻·····	(三九)
李聖五先生：揮淚辭「商務」·····	(五七)

#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打開法文的早報，在中國記事欄極小的一角，突然發現路透社重慶的電訊：「汪精衛逃出重慶，避往河內。」當時我好像受到了電的打擊，如果這是事實，對於新聞記者的確是一件大事。

我立即向各方面連絡——當時在河內活動的K氏，木村氏，及河內帝國領事館等都急速地連絡着。不久本社（東京日日新聞社）的香港支局來了電報，河內的英文中國郵報（China Mail）和大公報也有同樣的記載，各方面都以爲這事情好像是確實的。

在這裏，我用一句話來說明，安南的報道機關是不完備和沒有能力的。假如不明瞭這一點，對於以後所記的事實，恐是不會被諒解的。安南的所謂新聞，用法語，安南語，中國語（祇有西貢一個地方）發行的三種報紙，每天祇不過發行一千份上下，是極其渺小的。從新聞的內容看起來，也是極其貧弱的。用自己獨有的方法收集材料簡直是沒有一家做得到。大部份是用法國哈瓦斯通信社的支社亞立甫通訊社所提供的，在外國通訊社用英語廣播所記錄下來的同盟，中央，路透，AB等的消息，都按日逐條排在白紙上。其他的新聞也僅僅是地方通訊，和官廳的佈告而已。至於各種論文，不過是補白的東西，在我的「新聞」觀念看來，簡直是不成樣子的。一句話，安南的報紙，祇是「法國僑民會報」的程度。安南語的報紙，更是追隨法語報紙之後，所謂編輯，祇不過是如同飲茶一樣隨便罷了。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想從安南的報紙來得到關於汪氏行動的情報，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以為，要得到特別的消息，祇有向安南當局使用探詢的手段，和向中國人方面實行偵察的兩個方法。

在安南方面，我因爲是「新聞記者的關係」，多少還有點連絡，但他們對於這件事並不曉得；我又想到汪氏從重慶飛來，便訪問歐亞航空公司，也得不到答覆，看乘客的登記簿也找不着；我想，也許他是用假名的，訪問亞立甫通訊社也沒有結果；再訪問各新聞社，也歸於徒勞；全部新聞記者的手段用盡了，還不能知道這事實的眞假。

最後的手段，祇好使用間諜了。不過，因爲我從來沒有這個必要，所以並沒有帶着一個間諜來。要一朝一夕間得到一個間諜是不可能的，也不能把他培養出來。在這樣的急需時候，真是沒有辦法。

實在的，我已經走向日暮窮途了，對於本社重大的使命，儘可能早點盡打電的使命，但現地的新聞，手頭上一點也沒有。

在深刻焦躁的夜裏，我到海防去訪問總領事館的橋丸書記生。我拿了這樣的情報回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氏，爲着交涉關於運送軍火的問題，前日到河內來。」

廣東陷落後，由於我方（日方）要求的結果，從安南運送援蔣的物資正在減少的時候，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張公權氏，爲着與安南當局折衝交涉，曾經來越，可是，事實上並沒有成功；而這一次外交部長王寵惠的親自出馬，所以成爲汪氏逃走的謠傳也說不定的——我們大家都下着這樣的判斷。

不過，從香港支局來的電報，却強硬地指出：「除王寵惠到安南以外，汪氏的出走，是絕對沒有錯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在下村日本僑民會長招待日本有名的僑民席上，同盟社特派員大屋久壽雄氏向橋丸書記生提出關於汪氏問題的質問，究竟海防所得到的情報是不是眞確的，從下面的事實上便可以判斷。即橋丸氏會詢問一個和他有關係的中國人，Wang-Chung-Hui的來，「是不是外交部長的汪？」他

答覆：「是的。」後來大屋君對橋丸氏又不客氣的指摘：「這一個中國人的知識程度是不是很高的，對於利用中國人作特殊任務的時候，不要給他什麼暗示，應該用誘導的質問才可以的。中國人常常要使我們疏遠着中國的現狀；還有，假如他要達到得着報酬的目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會迎合我們的心理也未可知的。」

這樣的結果，我們想，也許這一個中國人並沒有曉得是汪精衛，所以把容易誤會的 *Yang Chung-hui* (王寵惠) 與 *Wang Ching-wei* (汪精衛) 的發音弄錯了也未可知。

汪氏真的到河內來了嗎？要是來了，藏到什麼地方去呢？在茫無頭緒的情形下，又過去幾天了。正當這一個時候，在某處作事很久的一個安南老人，我便託他向總督府內，他的有力的朋友那裏去調查真相。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他的第一個報告：

「汪氏的確伴同他的夫人到河內來了，在巴尼愛(譯音)街二號，由中國某珠寶商人的盡力下，秘密他的身份，現在入了市內某醫院。」

於是立即不擇手段地和那一個廣東的珠寶商接近；同時對汪氏可能進入的特納山醫院和聖保羅療養院調查這一真確的事實。在這個時候，我痛感到情報網確立的必要了，於是用五個安南人和一個法國人來做間諜。調查了這兩個醫院以後，又歸於徒勞。十二月三十日又得到「汪氏在河內郊外八十七基羅的達姆泰阿」和「在海防郊外二十二基羅多宋」的二個情報。

於是，卽夜，由木村氏駛汽車到海防，而我又偕着兩個助手到多宋去。苦心地向旅館和其他地方調查的結果都落空了，這樣子確實的證據，一點也得不到。

不過，在香港，汪氏的機關報，已經破天荒地發表和平的建議了。汪氏的活躍，已在我們的眼前，



但是，他住在什麼地方，却無法知道。祇好拖着極度的焦躁和憂鬱來迎接新年了。

一月二日晚，在某處的坂本君突然來了一個情報：「汪氏的確住在達姆·泰阿的多迦斯加·泰爾番旅館中。」同時我們的情報網也得到達姆·泰阿的旅館，從他在河內的總店「美突羅堂」旅館寄出了六個人的舖蓋，食料品和其他的物件的報告。

這一個達姆泰阿是在河內西北八十七公里的「東京達爾特」裏面，那是一座標高千四百米突的石灰山。在二千米突附近，有一所避暑的住宅。河內的「美突羅堂」旅館便在這一個地方設立多迦斯加·泰爾番旅館，本來是預備在酷暑的時候吸收避暑的旅客的。從冬季十二月起，至三月底便封鎖了，在封鎖期間，祇不過留着幾個僕歐，並沒有接客的準備的，這一次也祇有汪的一派才能到這個地方來。

十多天以來，每日奔跑，苦心慘淡地，在我們同人一致的協力下，訪尋汪氏的住所總算是成功了。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即，以新聞記者的資格，關於汪的問題，怎樣去處理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收到在香港新聞紙上發表的汪氏的和平建議。我和K，橋本兩君便開始理論上的鬥爭，拿汪氏和平建議的文章來檢討他的真義，我們認為他的離開重慶，並不單單是逃避，這問題一定是很複雜的。在中國及外國通訊社會有這樣的意味深長的報道：

(一) 汪氏因病赴河內療養。

(二) 帶着蔣氏的密令，訪問外國，為中國抗戰而活動。

(三) 蔣氏禁止中國報紙非難汪氏及其同志。

我們對這些報道的真假，在我們的判斷中並沒有受到欺騙。我們議論的中心，是下面幾點：

(一) 近衛聲明和汪氏聲明，中間有怎樣的關係呢？

(二) 是不是和蔣氏發生意見而離開重慶呢？

(三) 表面上是逃走，裏面是不是得到蔣的諒解而另有關係呢？

(四) 今後的行動怎樣呢？

在事變前，和中國方面有特別關係的木村氏，他的意見以為：「以汪氏廉潔的人格判斷，今天，他的行動是不會含有陰謀的要素的。正如汪氏的和平建議中所說：因為公然主張和平的意見，便和蔣氏的意見起了明確的對立；結果，祇好用逃走來貫徹他的主張。」對於這一點，K氏却認為：「汪蔣之間，或者是有暗中的諒解的；因為蔣氏以抗戰建國的立場，在情勢上，公然倡導和平是不可能的；也許抓着和平的機會，便使汪氏出來活動，也未嘗不可。」

我們對於這兩個人的意見，都認為是有事實上的根據的。對於汪氏主張和平的真義，這個問題，是有慎重而又慎重處理的必要。特別是，在遭中間，日方與汪氏究竟取得怎樣的諒解，我們都認為他是為着疏通而來，是沒有疑義的。

我是個新聞記者，我十分知道，我負有全面報道的使命；以新聞記者的立場，是不能不排除一切的困難，以汪氏為新聞的題材的。不過，報道是不能不以國家全體的見地來作判斷；現在已經不是脫離國家的見地，為報道而報道的時代。從本社來的密電，指令我：「查明汪氏隱居的住所，排除一切困難，收集此項材料。」可是，我對於我自己的信念是不能移動的，我們認為近衛聲明和汪氏聲明之間，是沒有什麼關聯的。這樣輕率地，以我這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去訪問他隱匿的住所，我担心着，對於他的立場，是不是會有些不利呢？還有，訪問的結果，使他隱匿的住所，暴露於中國人與安南人之前，也是有問題的。我有點迷惑了。在迷惑中，我自己並沒有停止我的工作；我裝做觀察大劍嶺山的模樣，駛汽車

經過達姆泰阿到更遠的方向去。不過，我並不以從山麓間遙望達姆泰阿爲滿足，我同時用種種的方法和手段，不斷地努力探明這一個真相。

一月九日晚上，我得到汪氏於是日下午五時從達姆泰阿下山，到美突羅堂旅館去的情報。這個事實，在我們的想像中，他是不會離開河內到別的地方去的。K氏也作同樣的意見，究竟怎樣去訪問他呢？我們以爲最好先寫封信去，在K氏和木村氏的協力之下，我們很快地寫了一封日文信，和一封信法文信。十日夜九時半的樣子，我們便帶着信到美突羅堂旅館訪問去了。把信送去以後，便鎮靜地等待着。會仲鳴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和曾氏最初的會見是在美突羅的沙龍裏。這個時候，知道汪氏不會離開安南，我們便安心下來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我乘汽車到達姆泰阿去了。在旅館裏祇有幾個僕歐正在擦地板，幾個電燈工人在做着工作。我正擔心不能走進去，而想跑回來的時候，幾個僕歐却沒有禮貌地把我領進去。我僅僅給了他們一些酒錢，他們便喋喋地說：汪氏住在三百三十四號，他的女兒也在那裏。

在廊下等了很久，我是打算今天無論如何要會到他的。會仲鳴氏在走廊的電話室裏，不曉得和那裏通話，大概有三分鐘之久，由電話裏送出一個一個的阿拉伯字的電報號碼。

我和曾氏第二次會面的時候，曾受K氏的委託，說明他自己會到美突羅堂去找他，好幾次都碰不到，他是希望和曾氏會面的。然後，又問了幾個問題，約略談了半個鐘頭，我便下山了。

一月十九日，香港南華日報的林柏生氏被刺了。十九日晚，汪氏等又第三次由達姆泰阿下山到美突羅堂去了。二十八日，在可浪（譯音）街二十七號買了一座新建的房子，汪氏移到那邊去了。裝設了兩個電話，預備二架汽車，大體上好像要準備在那裏久居的樣子。在這期間到處宣傳着，許世英和王寵惠受

了蔣的命令來與汪氏談判；又有汪氏到香港，到上海去的謠言。我漸漸和曾仲鳴接近了，也得到他的相當信任的樣子，隨時在必要的時候都可以會面；不過，他是守口如瓶的，一點真相也發現不出來。曾氏和K氏的會面，因為還沒有到這樣的時機，中間便斷絕了。這個時候，汪氏的立場已經有幾分知道了。對於汪氏的問題，是不是可以由新聞記者來任意發表呢？但每次依然在不發表的方針下。

一月二十八日，從香港總領事館來視察的黃田領事來了，從這情況看來，他是會和汪氏會面的。K氏和高秉武氏在二月六日從河內一同乘廣東號輪船經香港到內地去了。他們回來以後，一切的真相都可明白了。我們都翹首期待着他們的回來。在這中間，我常常和曾仲鳴氏會面，始終沒有斷絕連絡，曾仲鳴也相當的信任我們。

三月十三日上午和曾氏會面了一個多鐘頭，簡直是含笑生花地談着。那時的曾氏實在是隨便大搖大擺地來去着。不過，從我們的眼中看見，好像常常有幾個中央系統的中國人把他們監視似的。我們便忠告他，要他小心點；但他却帶笑地並不接受：「那裏的話，他們祇不過是監視我們的行動而已，絕對沒有危險的。」後來，不幸地中了我們的預料，他被槍殺了。那些犯人大概是在三月五、六日的樣子，由海路再經陸路來河內的，是做得非常周到的伺候時機的中央系統的暗殺份子。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大體上得到如下的結論：蔣氏與汪氏之間，在沉默的諒解下，或者是全然掩蔽着；兩者之間也許沒有什麼連絡的。從這樣的線索可推知蔣氏對於汪氏和平運動的進展，是深刻地注意着，在他自己的期待中，會和從前一樣，採取不即不離的態度。不過，一旦到了走向他所不希望的方向的時候，便不能不用最後強硬的手段，和出以壓迫的態度了。這一次首先狙殺曾仲鳴氏，也許是一種手段也未可知。從蔣氏對汪氏的親信逐漸加以暗殺的行爲，而並沒有直接危害到汪氏本身的事實看來，也

許是恐怕招致蔣氏自己的不利。(內部的動搖，和有力者的非難。)所以對於汪氏的一派，祇有牽制，而他自已却以為這是一種高明的圓滑的手段也說不定的。不過，危險確是隨時隨刻地接近着汪氏的身上。

雖則在日本與汪氏業已諒解的今日，我們也不能不採取極慎重的態度。

可浪崗的住宅，自會仲鳴氏被刺以後，馬上便到處傳播着，這是汪氏的隱居之所了。在住宅的周圍，不分日夜地有二名法國警官，幾名土人警官，及便衣的中國人數名在警戒着，又花了很多的工夫來修理被破壞的地方，用鐵板做着防禦的工事。從情報網的報告裏曉得，汪氏已經不住在家裏，到了達姆察河去了。

從此以後，漸漸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來了。連續着有重大的事件。我在這裏借用○君的簡明的日記，便可以正確地看到事實的推移。

四月一日(星期六) 關於汪氏的三十一日發表的第三次聲明「舉一個例」，到可浪街訪問汪氏，叩詢他的意見。因為到這個時候為止，還不曉得誰是會仲鳴的繼任者。汪氏一派的聯絡完全斷絕了，也就沒有達到目的，祇是留下一封拜訪的信，便回來了。午後五時得到電話，是流利的法國語：「我是汪先生的一個祕書，你早上的信收到了，希望明天早上會面，時間和地點，明天再打電話告訴你。」我把這個告訴K氏和木村氏。

四月二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來電話。要我帶個黑眼鏡，注意不要帶着另外的人，上午十時到美突羅堂旅館三三四號房間。他自己用Chan Ta Ko的名字說：「這個並不是真名字，這一次汪先生要我繼任會仲鳴先生的工作，我是法國留學的。」雖則是第一次的印象，已經覺得是可以完全信賴的好人物。

我得到對於汪氏聲明的原文，和昨天的信上的回答。後與K氏，木村氏研討汪氏的聲明。

四月六日(星期四) 從日本的翻譯某君手裏，得到大公報暴露「平沼——汪的和平密約。」我與K氏協議，在我們的想像中，我們這樣子擔憂着：是不是汪派中有人和重慶祕密連絡，逐一通報着呢？重慶對汪氏的「舉一個例」採取報復的手段了。這是暴露的戰術，是沒有疑問的。這一個通報者是不是高宗武呢？

在K氏的家裏召集木村及坂本兩氏會談。席上K氏說，最近有二個「客人」來，也許是爲着汪氏脫出安南也未可知的。並嚴肅地相約，要這一件事的實現，須由我們四個人全力合作。

四月七日(星期五) 午後六時應K氏召，木村氏亦在坐。K氏的說明：「約五時，領事館的直丸書記生來我家，他說：『今早領事館收到中國人送來的一封信。』他會把這封信拿來的。」從這封信上看，是寫得一手很好的日本文：

「要來的二個人，來了沒有，望賜覆。回信用的信封，一同送上，請照上面所書的地址送下。中山，七日。」回信的信封是這樣寫的：

“Madaue Ming Chamber No. 334 Hotel Metropole.”

最近要來的二個人是金田(假名)和石貝(假名)。中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以前曾有暴露「平沼——汪密約」事件，關於「客人」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洩漏給重慶方面的。這一封信，有沒有問題，也是不可知的；對於這一封信的答覆，在沒有曉得這一封信究竟是那一個人寫的時候，是不放心的。到美突羅去會Chen，沒有會到，又到可浪街去，說Chen出去了。問管門的人：「在汪氏周圍有沒有中山那個人？會寫日本文的是那一個？」答覆是：「沒有中山這個人。會寫日文的祇有汪先生。」把

名片留給Chan，要他趕緊來電話，便回家了。

四月八日(星期六) 與Chan沒有連絡。上午十一時，有一「中山」這個人打電話給領事館，用極流利的日本話說：「昨天的信，請答復。」總領事館因為什麼都不曉得，在得不到要領的時候，他說：「那麼，就這樣子吧，話是講到這裏為止。」便把電話掛斷了。這封信和Chan沒有連絡，實在是不可思議的。這樣子，在「客人」沒有來以前，萬全的準備是必要的。協議的結果，有下面的決定：

一、住旅館是危險的，「客人」住在坂木的家裏。

二、客人與汪氏會面的地方，決定深夜在達姆泰阿。

三、汪氏出來，經過杜美羅橋是危險的，決在晚上從達姆泰阿直接到海防。因此，在達姆泰阿與河內之間，晚上九時配置汽車二輛，停在適當的地方。K氏與金田和石貝兩氏的汽車在離河內約五百米突的地方；我自己坐一輛空車，用手電筒的暗號，去和已經約定好了的汪氏夫婦，從達姆泰阿出發的汽車相會；然後，汪氏夫婦轉坐我自己汽車來；汪氏夫婦原來坐的汽車，裝做回可浪街住宅的樣子，回河內去。交代了汪氏夫婦的汽車以後，我們的車子便開走，同時K氏的汽車在後面，約有五百米的距離，一路警戒着開到海防去。在海防有二、三名坂本心腹的部下警戒着。在啓程以前，用適當的方法，把使用過的汽車司機軟禁起來。

以上的方法，定由K氏，木村，坂本和我自己作預行演習一次。深夜與Chan取得連絡了，要明早會面，因此預行演習便延期了。

四月九日(星期日) 午前十時與Chan在美突羅旅館會面。我拿出那個回信用的信封，他說：「這是命令我送去的。」那時候我通知他「爲着答覆汪先生的事」，K氏要和Chan會面。今後關於脫出河

內的事，一切連絡，決定由我轉知汪氏方面的 Chan。

午後 K 和 Chan 會見了，會見的方法，是在河內市外，太湖的散步路上。午後九時，我和 K 氏在太湖散步的時候，Chan 的汽車從後面來了，他坐到我們的汽車來，在太湖邊慢慢地轉了一週。

是雨的一夜，在預定的時間，預定的地點，一切的事情都很順利的進行着。這個時候和 Chan 一同來的，還有一個人，照例是一中山氏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我們在太湖的周圍駕駛着，在很少有人經過的堤上。我們停車下來，中山和 K，Chan 和我，分成兩組，在黑暗的堤上逍遙遙地一邊走一邊談着。K 氏對中山講述他的計劃，也聽着對方的意見，約三十分鐘，再乘車到河內，便分別了。

四月十日（星期一）好天氣。K 氏，木村，坂本和我四個駛着汽車，依照原定的計劃，帶了手錶和地圖，實地測驗從達姆泰阿到海防去的路線。

四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後，接到 Chan 來的電話：「來喝茶嗎？」便到美突羅去了，詳要說明「客人」的動靜和今後連絡的方法。利用美突羅會面是十分危險的，要隨時變更會面的場所。我們決定下面的暗號：

看電影去（表示午後八時半乘汽車在太湖的散步路上會面。）

喝茶去（表示電話後，十五分鐘內在美突羅三三四號房間會面。）

散步去（表示電話後十五分鐘內在植物園散的步路上會面。）

K 氏爲着迎接「客人」與坂本到海防去了。

四月十六日（星期日）金田，石貝兩氏於午後四時到海防港內。

四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半，在 K 氏和坂本氏的引導下，金田和石貝進入山根氏的私



邸，在午後，山根氏私邸前開始覺得站有幾個中國人和安南人。

在美突羅及植物園內與 Chen 連絡了兩次，報告「客人」平安抵埠了，並商議和汪氏會面。二次連絡的時候都有金田氏的信。

夜九時赴美突羅送去金田氏的復信，明早八時，在動物園等候對方的回信。

四月十八日（星期二）午前八時，預定的覆信來了。從中山和Chen兩君的口頭上提議，決定汪氏和金田在今天會面。

會面的方法怎樣呢？再三協議，慎重研究左列三個方法：

- 一、做照前例，利用黑夜乘汽車到野外會談。
- 二、由我們引導汪氏到指定的場所。
- 三、我們到汪氏那兒去。

結果由我向中山及Chen提出，作如下的決定：

- 一、時間在午後一時至二時之間。
- 二、在所定的時間，他們的汽車停在指定的位置上等着，我們比他們遲到二分鐘，在他們停車的位置前約三百米突下車，徒步前進。

三、我們的「客人」坐上他們的汽車，到汪氏的地方去。

四、他的汽車將「客人」送到植物園為止。

因此，相會的地方定在跑馬場附近，時間一時四十五分，後來我們到跑馬場附近實地調查後，共同在坂本家裏午餐。

看準了時間（和 Oris 的手表對準了的），我們分坐二輛汽車出發。

篷車——K氏，我，山根。

轎車——金田，石貝，矢野，坂本。

到所定的位置下車，我和K氏、坂本和山根，裝做散步和看風景的樣子漫步着。

我的臉色變了，在所定的位置上，汪氏的汽車沒有來，附近一帶也沒有影子，時間漸漸過去了，我驚訝地和K氏商量，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樣子，也祇好回去，另行計劃了。正在急於要回去的時候，路上一輛汽車，掀起黃砂，飛快駛過來，剛好看到車子裏面有金田氏的樣子，汽車便像箭似地過去了。

我們馬上乘着篷車追蹤去，結果確實曉得是到了可浪街汪氏的住宅裏才安心下來。

會談了二個鐘頭的時間，完畢。

四月二十日（星期四）晚上，突然汪氏方面來信，謂身邊非常危險，希望今晚坐我們的船去。他們感覺出，最近我們的行動，頻頻被藍衣社方面的中國人在出沒偵查着了，要逃避他們的視線是相當苦心 and 困難的。

從汪氏的來信中，曉得汪氏住所的鄰家三層樓上，今天被人用歐亞航空公司的名義借去了。據情報說，他們都是藍衣社，萬一從那兒掉下爆炸的東西來，什麼都要完了。

我們的臉色又變了，很快的作了非常的配置。

九時半，坂本氏爲着準備汽車，飛快地到海防去了。午後十時，他再去汪宅連絡，他回來說，法國當局負有性命保障的責任，今晚用不着坐船了。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金田、石貝氏等午前九時從河內去海防，乘北光丸出發。

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得到 Chen 會面的通知書，晚八時半在河內醫大前空地上連絡。從中山和 Chen 兩君手中收到很長的信，在公園的路燈下看了，因為內容重要，即刻到 K 家，召 木村氏，作更進一步的協議，內容如后：

「汪氏等定四月廿五日晚由河內出發，是晚深夜乘坐停在洪建附近卡特巴島北面的法國船鳳安(譯音)號，於二十六日上午六時至七時之間啓航，希望你們遲點啓航。」

並附有鳳安號停泊地點略圖，和無線電連絡用的符號，及其他應該詳細注意等項目。即汪氏等，二十五日由河內出發，向洪建的路上走，到海岸後轉乘小汽船，開往停在卡特巴島北面的法國船鳳安號，於二十六日早晨出發到上海去。

最初的計劃，汪氏到上海，是乘北光丸的。改乘鳳安號是因為汪氏沒有護照，不能出國，後來得到安南當局的諒解與援助，在總督府的好意下，將當時停在西貢港內的鳳安號(七百五十噸)租了一個月，又在保安局的好意下，便得以準備二十五日啓航。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早上K氏將汪氏的書籍帶往海防。海防的坂本氏與北光丸在連絡中。

在某地停留的Y氏來電：「上海的準備尙未完畢。」我立即急追出發後的K氏，晚九時半，與K同時回來。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我把K氏攜來金田氏的親筆信，上午十一時在美突羅與中山和 Chen 會談，萬事 OK。要是鳳安號更改航期的時候，可以直接打電通知北光丸，北光丸決定在拿前計爾島北十海里海面上等候鳳安號。

要是二十六日到午后六時為止，汪氏方面未去的人，對我們再也沒有什麼連絡的時候，便表示萬事

在順利進行中。又在汪氏出發後，爲着必要的佈置，需要散播如下的謠言：汪氏在安南當局的諒解下，到交趾地方養病去了，一個月後回來。並準備其他爲着安全上必要的手段。

我和中山及O.握手，共祝航路安全及計劃成功，約定再會的時間便分別了。這一切都很快的報告給K氏。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曇，小雨。夜間(時間不明)，汪氏等全部出發往河內，同行者有保安局長亞士力克爲護衛指揮官。

午後三時半，收到從北光丸來電：「行李搬出了沒有，速復本船。」「行李」是表示汪氏的意思。與K氏協議，想和汪氏派留下的人取得連絡，却落空了。發電報的時間是午後一時半。有不吉的預感，大家默然不語。

約定時間，到六時爲止，汪氏方面，並沒有來什麼連絡，我們想，大概是平安脫出了。會不會把他們送到廣東的北海去呢，我們擔心着。午後九時，會見汪氏方面存留的人，談起來，大家都失色了。

從他們的話裏，因爲天氣不好，開船的時間延遲了五個鐘頭，至正午才開的。可是，爲什麼沒有和北光丸的無線電取得連絡呢？

在不安中，確實知道啓航的時間延遲了五個鐘頭，有點安心了。

想把這些情形打電給北光丸，因爲電報局的不答應，祇好改到明天再打了。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不安並沒消去。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午後九時，金田氏來電報：「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在香港附近取得連絡，請安心。」

汪先生河內脫險記

一六

爲著和平救國從重慶脫出的汪先生，現在又由河內的隱居脫出，往上海去了。

（譯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東京日日新聞）

# 汪先生苦難回憶錄

## 中日交涉祕話之一

活躍在和平建國大道中的汪精衛氏，今天的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四萬萬民衆的教星，在浪濤兇湧的現代世界史上，他被浮彫出巨大的形像。

汪主席今天能升任他的榮耀與顯職；在他過去的遙遠的途徑中，他是曾經保有過任何革命同志的經驗，曾經受過不止一回的，鐵火的洗禮的。

以一黨的領袖的地位，在離合無常的過程中，維繫部下的苦心，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在過去二年以來，汪氏可謂無日不在以性命來換取勝負的情況中；不過，以局外的人看來，汪氏最大的苦難，可說是已有二次。

其一，便是從重慶脫出，寄居河內的時候，汪氏最倚賴的同志，曾仲鳴氏的生命被暗殺。其二，便是汪氏在上海，準備建設中央政府將要完成之前，在一黨中參劃相當機密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兩氏的逃走。他們兩人，不僅是脫離汪氏的系統，同時還在香港暴露捏造出來的中日國交調整的草案，指爲賣國密約，而在他的恩師汪氏的臉上投以唾沫。

這二次的經驗，到現在爲止，回憶起來，汪氏還是會交流着憤激的熱淚的。

曾仲鳴氏的被暗殺，當然是汪氏的替身。同時在曾氏的建業途上，也正是一次最大的殉國，在他臨終的悲痛中；「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的妻子。」這彌留的句語，正是汪氏追悼曾氏的逝世，在前年

三月二十八日發表第二次聲明以後，五月十九日的聲明中，用悲憫的心情下記出來的。同時他還說：

「在暗淡的燈光，異國的客居下，緊握着血染了的，冷却了的，同志的手，我感到了前途的漆黑；重傷了的心，比重傷了我自己的身體有更大更大的悲痛；好像在我的胸前感到挖開了一個極大的洞穴。立時間，事情是停滯了，和平的道路突然被割斷了，我爲自己想，也不能不爲同志想；我喚起了自己的勇猛的心，但，已經是受了極大的創傷了。……」

講到了曾仲鳴同志，在他暗澹的感懷中，汪氏的臉常常會顯出一層不可解的顏色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正在羣雄會集退上，汪氏的陣營，在和平建國的大旗下，着着準備中央政府的建樹，而「臨時」及「維新」兩政府的首領王克敏和梁鴻志兩氏，爲着和平派的大同團結，歡迎汪氏去青島會談的時候；在汪氏陣營中，參劃一黨機樞的高宗武陶希聖兩氏，却捉住汪氏去青島的機會，便忽然銷聲匿跡，一時使全黨都感到愕然。青島會談，是最後的大局的決定，也就是最早所期待的最後關頭。

昨日之友，今日之敵，此兩氏的逃往香港，可謂背信不德，也不能不使周佛海氏爲之下淚，爲之扼腕切齒了。汪氏在那個時候，召見他的親近某君，申訴他那悲痛的心事；而某君在拿出高陶兩氏致汪氏由電文之後，他說：「一黨的結盟，是國家大事，中途脫退者在所不免，望能貫徹初衷。」在那個電文裡，高陶他們還這樣地寫着：

「際此意志迥異之時，未得先生之許可，遽爾引離；但，至此時止，我等對於一黨的機密，決不向外宣洩，尙祈放心。」

汪氏看了之後，他說：「這不過僅僅是一種安慰而已」。某君又繼續地說：

「從日本的赤穗浪士之義舉想起來，最初參加大石內藏之助的盟約者有二百數十餘名；可是，起一

黨有事的時候，脫落者便漸漸地脫落了，最後祇餘四十七名；不過，在多數的脫落者中，沒有一個人背叛，也沒有一個人作內奸；這正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和中國國情相異，但，大事之行也，却是相同的。高陶兩氏的引離，也應作如是觀吧。」

這樣地激勵汪氏之後，汪氏便拂去胸中的積鬱參加青島的重大會議了。

忽然，逃到香港的高陶兩氏，捏造中日國交調整草案的一部，在「汪的賣國密約」標題下，由香港大公報全面暴露了。聽到了這一背叛的報告，汪氏的熱淚沸騰了。他說：

「脫黨的事件，還可以忍耐；不過，這卑劣的背叛行爲是不可恕的。前日某氏所講的日本武士道並不是我的同志，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這樣的不德來計議國是的將來，是不可能的。商談建立東亞和平也不能自信了。唯一潔身的方法，祇有置政治於度外。……」

汪氏仰胸號嘆，爲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這是汪氏和平運動史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汪氏最大危機的時候。

不過，天下事是無足畏懼的，勇猛的心，再在汪氏的身上建立起來了。

青島會談，平安地進行着，汪氏的陣營再度勃起了，像奔流一樣，和平的機運，把一切的障礙捲入同一的渦流裏，向前急流着。

在汪氏和平建國的大旗下，全國的具有同愛的人士，不管他是不是國民黨員，或者是無黨無派的，都翕然地參加到這奔流裏飛馳着。

江南之春來臨了，燦光爛輝的事業在展開。在紫金山上，國父孫總理的靈靜的酣眠下，三月三十日南京慶祝還都典禮光輝地舉行了。



從這一次中日國際條約的調印看起來，正是一帆風順地向着和平的大道前進着的。

（譯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

# 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險記

## 中日交涉祕話之二

新的國民政府，今天已進入新的出發點，中日條約的調印，刻劃出一條鮮明的界線：在颯爽英姿下，充滿熱情地，向前邁進着。

無論那一個時代的革命，都是需要熱情的，不惜犧牲性命的，血的創作，在汪派的陣營中，宣傳部長林柏生氏便是最熱情的，最有信仰的，一個年青的革命者。

今天，在國民政府的光輝與欣慶中，他想起了鬥爭時期中的香港，記者經過首都憲兵警衛下的正門，進入宣傳部的部長室，在充滿着溫暖初冬的陽光下，窗前豔麗的梅花，正含苞待放着，林柏生氏穿着咖啡色的中山裝，我們親切地在對談。

後面是林先生的談話：

我到香港，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考慮準備發表汪先生在河內的第一次聲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電報。當時，我和梅思平是由重慶政府派到香港去的中央宣傳部特派員，所以堂堂皇皇地，由重慶出發，公然到香港去，因此，是沒有「重慶脫出」的祕話的；不過，在這裏還有多少是值得暴露的地方。

我和梅思平在香港，因為是重慶的宣傳部特派員，我們便公開地活動了：事前的工作，是開始集會文化人和通訊社，研究怎樣來發表汪先生的通電的問題，在充滿抗戰意識的香港，把這一個炸彈似的和平通電發出去，我們是考慮到，不能不以生命來換取的。三十日的晚上，重慶方面大概已經知道我們的

企圖了，便對香港的報館，加以猛烈的警告；也正好這一天，我們把那份通電發出來，香港各報館便不禁愕然。

以重慶特派員的資格，發表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通電」，他們的驚愕是不足為怪的。電報在報紙上發表以後，馬上便接得宣傳部長葉楚傖和蔣先生的秘書陳布雷的密電，詢問「周佛海現在在那裏」了。重慶爲什麼要這樣問，是很容易明白的。我的答覆是：「周佛海的住所並不曉得。」而這個時候，周佛海和陳公博，實在是在香港與河內連絡着，做和平運動的地下工作。

後來，即去年一月八日、九日間，重慶的暗殺，開始向我們轉念頭了，特務工作隊的首領，戴笠氏也在香港出現了，戴笠這一個名字，想來大家是曉得的。戴笠到香港後，他忽然通知要和我們會面，在表面上，我們都是重慶政府的機關，和戴笠也是同志，要是我們隱藏起來，雖則也是必要的，但並不一定很好。我們便答覆他：「好。請決定會面的時間和地點。」他便通知「地點在思豪酒店，時間另行通知。」所謂思豪酒店，正是他們的秘密機關，要是到那裏去的話，一定有生命危險；不過，當時，我們是不怕犧牲的，於是又通知他「可以在思豪酒店會面。」但，後來，一點的回音都沒有了。

在這期間，他又通知中央通訊社的社長蕭同茲要和他會面了，在通知書上很不客氣地寫着：

「最近看到你寫了很多和平論的東西，和重慶對立着；可以到我們自己所屬的陣營裏來做宣傳呢？攻擊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

對於這通知書的回答：

「在和平的途徑上，必要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絕對不是攻擊重慶政府。而重慶發表開除汪先生的黨籍，是不是攻擊個人呢？這又是從何說起呢？」

到那一個時候，他們便集中向我們所主辦的南華日報攻擊了，又放出火燒和毆打的空氣；但我們的稿子還是繼續地寫着，不過排字房的和印刷部的工人，却在威脅下逃走了；因此，我們的同志間有好幾天，便不能不從寫原稿起，一直到自己來排字和印刷了。後來，果然對我們的工人發生了毆打的事件。我從報館回家，每天總是晚上二、三點鐘的時候，在歸途中被暗殺團襲擊是極容易的。「要是被敵人包圍了，是危險的。」我們都這樣地說，一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回去得很遲，一直到天亮也在報館裏；這一晚上，在我家的附近，有一個人被暗殺了，聽說是樣子很像我的。這一個男子也實在倒霉，而我却奇蹟地沒有送掉性命。

十六日晨，香港警察廳的政治部長通知我們——我和國際研究室的梅恩平和現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去問話。當時，我們的同志是做著南華日報和國際研究室二件工作的，無論如何不能不到警察廳去看一看。

十七日午后三時，我一個人便出去和政治部長會面了。他說：

「我們得到的證據，因為想暗殺你，而另外一個不幸的人却被打死了。」

並且親切地要我注意不要出事情，然後又用暗示的口吻，而其實是要彈壓我們的運動地，在發問着：「汪精衛現在在那裏呢？」和「和平運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又用非常鄭重的態度說：「當心暗殺團，不能不講求一點禦防的方法的。要是寫封信到警察廳來，可以准你們攜帶自衛的手槍。」

談完以後，我和政治部長辭別了。在歸途中，我果然被襲擊，被二尺多長的鐵棒從頭上擊倒了，幸而我的骨頭非常堅牢，不然連命都沒有了。

在入院期間，我祕密地找到隱藏的住所，出院後便潛伏着，而且化裝到上海，那時化裝改名逃出來是並不很難的。後來却不同了，我又回到香港，由香港到廣東，再回到香港來；那個時候，我是以廣東爲中心，準備着在上海召集的六全大會的工作。在我的周圍，隨處都存在着可能被射擊的狀態。

八月十七晚，六全大會準備好了，最後要離開香港了。在我隱藏的住所的附近，門外佈滿了暗殺團的份子，要是離開一步的話，在我的身上，馬上會被手槍穿洞的。但，最後，終於逃到船上回來了。在船上，我關緊了房門一直睡到上海。

在我乘船回來的途中，仍然在香港做着猛烈的地下運動的有沈次高氏，他是汪先生的外甥，在臨別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他：「我要到上海去了，今天在路上和吳鐵城的弟弟所坐的汽車對面擦過，恐怕他是會見到我的，你留在香港，此後要特別地小心。」但，結果，這一位沈次高氏，當我剛到上海的時候，便被重慶暗殺了。

在香港，有一個經營旅館的同志，我們祕密地把廣東的和福建的同志集合在那裏開祕密會議。其後，八十個同志便平安地到了上海來。六全大會於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愚園路的汪公館開會了，出席的有二百十四人。

現在回顧起來，從會仲鳴起，好些同志都殉國了；現在我們正在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着，我們不知什麼時候也會死的，我們的血跡也許會變成後進的同志們的路基也未可知，站在生死的關頭，已經有好幾次了。爲主義而死，我們是準備着的。

我們對於今天的成功，並沒有滿足，我們是更爲明日而鬥爭的，勝利擺在我們的前頭。

（譯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東京朝日新聞）

# 和平運動的長成

## 中日交涉祕話之三

當前年十二月底，汪精衛氏從重慶脫出，飛往河內的報道，最初傳到上海的時候，我們在上海的新聞記者，對於汪氏的計劃，和重慶內部的情形，是無法判斷的。

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和平宣言在香港發表後，又連續作第二次宣示，這一個時候，上海的新聞戰線便感到沸騰了。

上海的財政界，因為汪氏第一次的聲明，金融市場已有幾分動搖的空氣。

由於重慶的政治壓力和暗殺，更使汪氏陷於無法活動的狀態。維新政府的陳籟氏，他認為汪氏停留河內，首先是會開始西南的工作的，不過，自一月十九日林柏生氏受傷，繼之曾仲鳴氏被暗殺，香港和河內已經是危險的地帶，從情報得來的消息，西南工作，已不能依照預定的計劃進行，汪氏在河內的停留，實在也是危險的。

一直到三月三十日，汪氏發表第三次的聲明，同時也發表汪氏離開河內的消息。爲着準備汪氏會到上海來，我們便開始作種種的活動；不過所謂活動，也等於是在五里霧中的。

當時的上海；日本與汪氏之間，還沒有連絡的機關，每天除了到碼頭去搜索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後來，從重慶和香港來的外電，在租界裏的中國報紙，又這樣那樣地登載着汪氏已入上海的電報，比方：上海導報的登載，「汪精衛於四月二十四日祕密來上海，正與日本派來次官級的要人，在極祕密

裏進行折衝中。」路透社的電報：「汪氏於四月中旬來上海，住禮查飯店中」。上海英文大美夜報：「在汪精衛來滬前，陳璧君氏早來上海，住百老匯大廈中」。等等不同的報道，而每一個報道，都在我們神經裏發響。到虹口的禮查和百老匯大廈去作了好幾次的詢問，又毫無結果。百老匯大廈的事務所，他說：「汪精衛氏絕對沒有到這一個旅館來，請你放心吧。」

到了五月，關於汪氏的和平運動，在租界內種種色色的活動，漸漸地表面化了，在情報裏，得到周佛海和梅思平等已進入上海和日本方面折衝的消息，高宗武，葉竹雲，羅毓麟等也有到了上海的樣子。而且還有人說看到了高宗武。

在中國方面，得到一部份人氏相當信賴的N氏，作為高宗武氏的代表，也來上海與董道寧會合，向日本傳達意志。於是一切和平的空氣漸漸地活動起來了。

再把五月二、三日間的情報綜合起來，我們得到汪精衛氏確實已離河內來上海的證據了。因此我便作如下的判斷和行動：

汪氏的船爲着免別人的眼目，或者是外國的貨船，對於奇怪的法國和義大利的貨船入港的時候，便乘車往碼頭迎接。從UP的報道，義郵船康脫羅素號入口了，早晨去迎接，沒有看到汪氏的姿態；後來，的確知道汪氏已經到了上海了，我們和其他新聞社的活動，費了相當的氣力，仿照和某社一樣的辦法，看到坐有像汪氏的樣子的汽車，便跟蹤他，結果，竟又演出被警戒中的憲兵，以舉動不軌，拘留起來的悲喜劇。

在我們這樣地繼續努力的結果裏，汪氏和中國的同志，及日本方面的協助者，終於乘着北光丸貨船，平安地在虬江碼頭上陸了。是五月六日，上海初夏的陽光照耀中的時候開始的，汪氏確實到了上

海，燈光燦爛的晚上，和平運動主要人物乘用的汽車，防彈的玻璃，也有好幾次給機關槍粉碎了。七月十一日，中華日報復刊，第一聲便宣言與蔣介石絕緣，而汪氏也發表第六次聲明。其後，八月底，六全大會閉幕，和平運動便以純正國民黨的姿態，依照一定的軌道前進着。

九月七日，汪精衛氏在事變以後第一次在汪公館接見日本記者團了。記者當時的興奮，至今還沒有忘記的。

從會客室裏進來，跟着汪氏之後的有褚民誼氏，林柏生氏，董道甯氏，及周烽庠氏。記者過去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南京會到過的面孔也逐漸出現了。

特別是董道甯和周烽庠兩氏，在一九三七年那個時候，每天在南京碰頭，展開論戰的。當時的董，是亞洲司的日總科長，周烽庠（現外交部次長）是情報司的日本科長，都是國民政府的代言人；亞洲司長高宗武氏，對於我們是敬而遠之的，會面很不容易，每日接見新聞記者都是董周兩氏。當時的華北正在酣戰中，外交部內也有相當的騷亂，我們最興奮的談話中心，自然是戰況了。我們曉得日本軍的優勢，對於中國側面報道，無論如何是不相信的，每次都在爭執中辭別了。不過，這個人却相當硬的，他們都是愛國者，他的堅持他們的態度；「這祇不過開始而已，假如幹下去的話……」，以下便大發他的議論。後來戰火漸漸地波及上海，日本的新聞記者便要到上海去。以董及周兩君為中心的送別宴，在國際聯歡社開備了，在席上又展開的猛烈爭論，後來都認為戰爭是不幸的，已經開始了的戰爭，最好不要再繼續下去的結論。宴會完了的時候，我們又互約：「此後，我們在戰場上會面吧。」這種的情況，現在想起來，仍像在目前一樣。

從周氏的翻譯裏，我們開始聽到汪氏的雄辯的理論了；當時，他們的氣魄是很大的，他們都以爲和



平運動是這一次戰爭所產出來的結果。

汪氏的談話完了以後，茶會的時間裏，我像對周君說：「好久不見了，很好吧！」周君微笑地說：「這一次辛苦你了，以後還需要請你多多幫忙的。……」我在他的微笑中，感到他的熱情濃長和從前一樣的，並沒有有一點消失。對於汪氏他們的和平運動，我們感到有無限的前途。（譯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至九日東京朝日新聞）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中日交涉祕史的插曲

在河內郊外的一條小溪旁邊，每天都有一個中國人在垂釣着。這一位目光矍矍的漁夫，正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汪精衛先生的姿態。

釣魚，成了汪先生每天的功課；可是，事實上，連一條最小的魚也沒有釣到過；但，他却極度地忍耐着，等待機會一到，自然會有魚上釣的。

連續着好幾天的釣魚生活，每天都有一個人經過汪先生的身旁，而且每次必定揩鼻子。普通中國人的習慣，揩鼻子是用手，可是，這一個過路的人却用紙來揩。

當太陽西沉的時候，汪先生便很小心地把這些紙收拾起來，裝到口袋裏，然後回去。

汪先生能逃出河內，便是這些揩鼻紙的功勞。這些紙便是連絡的紀錄。利用釣魚的時候，在街邊交換情報，這用意是相當周到的。

不過，在這巧妙的，小心的連絡下，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早上二點鐘的時候，不知道是那一個，突然地跑到可浪（譯音）街二十四號三層樓的汪先生隱居的家裏；射殺了作爲汪先生的替身的會仲鳴夫婦。由於這一事件，汪先生更不能不決定，趕快離開河內了。

汪先生隱居的家，是和上海交通着無線電的往來的。好幾次在他的腦子裏考慮着，如何脫出河內的方法。在外國的輪船上恐怕被發覺，在中國的輪船上恐怕被暴露，日本輪船又坐不得，怎樣才能渡過這汪洋的海水呢！

正當絕望的時候，他接到了有一艘祕密船停泊在河內的情報。好機會到了；不過暗礁還是有的，那

艘船停留的地方，離開海岸很遠；而河內又是抗日暗殺團的巢穴，怎樣才能離家到海邊呢？

正在感到煩惱的時候，偶然有一位熱血的青年，獻意在晚間裝做病人，被擡到醫院去，汪先生便依照這個計劃離開他的隱居之所。

五天以後，這一隻怪船便把汪先生安全地帶到上海，經過那一些什麼地方，還是用不着問的。（摘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上海每日新聞。）

# 舉一個例

汪精衛

曾仲鳴先生彌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曾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常在一處，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曾先生之死，爲國而死，爲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爲放心。這一息尚存，爲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爲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

我因發表號電，被目爲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日舉一個例吧。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 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 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 于右任 居正 孔祥熙 何應欽

列席 陳果夫 陳布雷 徐堪 徐謨 翁文灝

邵力子 陳立夫 董顯光

主席 汪副主席

祕書長 張羣

祕書主任 曾仲鳴

舉一個例

## 徐次長讓報告

「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礦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榭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候；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藩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

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龔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爲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客可以答應。再問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爲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爲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爲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爲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尙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尙不可知。」

附註一 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



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 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爲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僱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 徐次長報告所說，墨三，是顧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瀛，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尙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爲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尙未過去，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

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爲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尙未陷落，已經認爲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尙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蔑，誣蔑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爲國家效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覆，但對於和戰大計，却不能不再爲國民一言。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和之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有何不可？

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的人，只應該爲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爲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却以之爲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爲對內統一之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即搗亂。」我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為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決不應該俛仰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來就難過的，我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而後吐氣；大戰之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爲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

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為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為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怵於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毅然有所取舍嗎？我希望大家本着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和平建議之第一個犧牲者曾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們，往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路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當二月中旬，重慶會派中央委員某君來，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託他轉致幾句話：其一，我不離重慶，贛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還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亦不為無補。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仲鳴先生比我年青，却費志以歿，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採納，終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則我可以無憾。（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回憶與前瞻

周佛海

自從去年十二月五號離開重慶，十九號離開昆明以後，一直到現在，沒有公開的發表過言論。因為我的沈默，所以引出了許多的揣測。有人以為這是汪先生和蔣先生演的雙簧；否則，我不會離開重慶。有人以為蔣先生派我出來，暗中監視汪先生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揣測，據我所知道的，除掉共產黨徒及惡意者以外，我的朋友和一般公平的觀察者，對於下述兩點，意見是一致的。第一是以為我向來不是親日派，向來和日本人，沒有往來的，所以這次的行動，決不是受日本人的勾引。這種觀察是對的。我雖然在日本讀了七年書，但是沒有一個日本朋友。平日只知道上講堂，進圖書館，絕對沒有和日本同學交際過。回國以後，除掉兩個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有時和她們見面以外，十六年之間，沒有見過一個日本人。所以像我這樣的日本留學生，實在是很希奇的。因此，說我向來和日本沒有勾搭，這次不是受日本人的勾引，完全是對的。第二，以為我這次出來，不是為的個人問題，一定另有一種見解和主張。這也是對的。我在中央，不能算是失意，不能算是沒有地位。一個毫無憑藉的窮學生，掙扎到當時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十幾年辛辛苦苦所獲得的政治和社會的地位，輕輕的丟掉，去尋求一種渺茫空虛，絲毫沒有把握的個人的權利和地位，世界上沒有這樣的蠢材。聽說重慶有一部份朋友，說我膽小怕死，所以逃出來，這尤其是笑話。像我這樣地位的人，老實說，無論在何處，都是有堅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的。日本飛機，決不能輕易炸到，而且空襲的時候，已有「空襲警報」叫我們從容的準備。不像現在，時時刻刻在共產黨徒及重慶特務份子的暗算之中，又沒有「暗殺警報」叫我事前準備。所以現在所受恐怖份子的生命威脅，比以前所受日本飛機的威脅要大得多。為着要命，為着怕死，反走上恐怖更多，危

險更大的路，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素材！至於說到名譽，更不消說了。在共產黨徒及重慶所脅持的報紙雜誌上，當然用着漢奸，賣國，通敵的種種罪名，儘量的加以毒罵和惡咒。所以這次舉動，乃是犧牲地位，犧牲名譽，犧牲一切友誼和私情，犧牲一切歷史和成績，甚至犧牲性命的非常的舉動。爲着個人的問題，而要這樣犧牲，世界上更沒有這樣的素材！

既然不是爲的個人，也不是受着日本人的勾引；那末，爲甚麼要出來，爲甚麼要有這次的行動呢？這話說來很長，只好簡單的說說。不過在百忙之中，想到甚麼，就寫甚麼，不能做系統的敘述和說明。

這次的中日戰爭，真是冤枉極了。因爲是陰錯陽差的打起來，就不能不糊裏糊塗的打下去。在蘆溝橋事變初起的時候，兩國的當局，何嘗沒有就地解決的意思；何嘗不採取不擴大的方針。但是雖然都不擴大之心，而都處於不得不擴大的勢。在日本方面，當時在華的軍人，是氣餒萬丈的。他們以爲中國仍舊可以不戰而屈的，仍舊是可以威脅成功的。所以儘管東京方面，聲明不擴大方針，而平津方面，則儘量採取擴大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當時的當地軍人，也沒有把當時局部衝突，演成現在這樣全面戰爭的意思。在中國方面，當時的現象，更是可以痛心。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着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決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這些道理，共產黨，桂系及當時不滿意中央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蔣先生尤其比任何人要清楚。大家都知道戰爭不能擴大，不應繼續，而偏偏都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這種悲慘的矛盾，決不是將來的歷史家所能了解的。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份子，都很明白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調持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敏的，這種把戲，那裏瞞得過他？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得更高。在他的意思，以爲他的調子一高，一方面可以壓服反對的人，使他們失掉了倒

蔣的理由，同時對日本也表示自己的決心，使日本知道這次不是可以威脅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決。他的用心，實在很苦。不過他這種用心和辦法，不僅不容易獲得他預期的結果，反足以作繭自縛，逼迫他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我在廬山談話會的席上，聽見他發表關於蘆溝橋事件的意見以後，立即就發生這種感想。當時我就對朋友說，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未可樂觀的。因為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得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得深。同時，蔣先生本想以高調威脅日本，而日本當時在華的軍人，也不肯在蔣先生高調之下示弱。於是這邊調子越高，那邊態度越強。但是調子高是假的，態度強也是假的。無論調子如何高，態度如何強，當時都沒有從事全面長期的戰爭的決心和準備。不過一方面沒有想到高的調子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變低；別方面也沒有想到強硬的态度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化軟。於是兩方面在假的空氣之下，竟演成了真的空前的慘劇，使共產黨和俄國在傍鼓掌稱快！我想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應該互相抱頭痛哭，澈底的懺悔和覺悟！

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的毫無抵抗。因為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戡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箠。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所以我們的抗戰，只應限於北方，不應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戰。自從廬山談話會回到南京以後，我就和許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適當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復和平的關係。當時有三種觀察：一是戰必大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研究的結果，竟得第三種看法是對的。為甚麼戰必大敗？只要是稍有常識，而不絕頂糊

塗，稍爲理性，而不純粹感情用事的人，沒有不明白的，用不着多說。主張最後勝利的人，也明知道中國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但是他們總覺得國際形勢是會變化的，日本內部是會崩潰的。於是把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比天還大的問題，寄托在這兩個鏡花水月的幻想之中！他們強調只要繼續抗戰半年，俄國一定實際參戰，英美一定對日制裁，日本財政一定崩潰。那些主張，我們且暫緩以理論來反駁，只要先看看過去的事實，就可以證明其荒謬。半年，一年，一年半，到現在兩年了。國際的形勢，變化到足以使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程度沒有？俄國參戰了沒有？英美對日制裁了沒有？日本內部崩潰了沒有？儘管國聯接二連三的決議給中國以道德的同情，個別的援助，究竟這些同情和援助，能不能使中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對於俄國參戰的迷夢，到現在也應該醒了。去年張鼓峯事件的時候，一般人如癡如狂的歡欣鼓舞，以爲日俄大戰一定爆發。我當時和一位朋友相賭，如果這次事件會擴大，可以砍去我的頭。僥倖史達林同志，和我要好，替我把頭保住。現在滿蒙邊境的衝突，一定又有許多人在那裏懷着很大的期待。假使我又以頭來相賭，我相信史達林同志，仍舊還要和我要好，仍舊會替我保持的。至於俄國若斷若續，拿來換我們的茶葉和錫鑛等物的一點點飛機大炮，那何異醫生打給氣息奄奄的病人的鹽水針。要靠這點東西，去獲得最後的勝利，豈不是癡人說夢！至於英美的對日制裁，這兩年尤其表現得明白。唯一的結果，只是美國的政府，勸告飛機商人不要賣貨與日德意一類的國家。僅只這一點結果，能够幫忙中國打退日本嗎？現在重慶方面，對於英法蘇的同盟，美國中立法的修正，以及英法新嘉坡的會議，一定抱着很大的期待和興奮，以爲這樣一來，國際形勢，一定可以變化，抗戰的勝利，一定可以達到，在那裏自言自語的自己安慰。我相信即使英法蘇同盟成功，美國中立法修正，要靠這兩事實所引起的變化，來完成中國的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這兩件事的本

身，這是前途遼遠，難關重重呢？至於新嘉坡的會議，其性質全係守勢的，那自然沒有什麼影響及中國了。總而言之：無論那個國家，各有各的利害，各有各的環境，不顧自己的環境和利害，單因為同情而替別的國家和另一國家打仗，只有我們中國，才做這種蠢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還不多見，怎能希望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呢？或則有人以為日本要實行東亞門羅主義，破壞門戶開放政策，所以英美爲着自己的利益，一定會和日本打仗。這話可從兩方面觀察。第一，日本是不是要在中國排除第三國的權益。我以為日本的外交政策，決不致這樣愚笨。最近會着日本朝野人士，更證明我的觀察不錯。小的磨擦，當然難免，根本要排除英美勢力，日本現在，確實沒有這樣打算。第二，即使日本這樣做，英美也不會因為在華的權益和日本打仗，至多也不過經濟制裁。而經濟制裁，是否能置日本於死地，又是很大的疑問。所以想從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去尋中國的最後勝利，不是空中樓閣是甚麼？至於日本是否崩潰，我現在不願多說，以免爲日本辯護，替日本宣傳的嫌疑。但是當時我就說過，如果戰事延長下去，日本當然是要愈益困難的。但是日本感覺着癢的時候，中國已感覺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覺着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這不是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只要冷靜的剖析一下客觀事實，就可明瞭。所以日本也許崩潰，但是中國崩潰在前。因此，想在日本崩潰之中，尋求中國的最後勝利，也何嘗不是空中樓閣？

以上所述的事實，雖然是事後回溯，也許說我是一事後有先見之明；但是在當時確早已料到要從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內部的崩潰之中，去求中國的最後勝利，是斷沒有希望的。只要是稍有民族思想和愛國精神的人，誰願做敗北主義者？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決不容許我們的空想。因此，我斷定戰必大敗。



然而戰必大敗，和却未必大亂。當然，當時——現在仍舊如此——共產黨，桂系和其他失意無聊的份子，都以抗日爲倒蔣的工具，拿着抗日的題目，去逼迫蔣先生。但是如果蔣先生在適當的時期，毅然主張和議，政府的力量，實在足以控制全國而有餘，實在足以壓服各種反對勢力，使不致於大亂。不單是當時，就是現在，如果重慶方面，一旦覺悟，停戰議和，雖然共產黨會拚命的反對和搗亂，但是決不致使政府動搖，決不致使天下大亂。這種理論和事實，只要是稍爲明白各種情況，稍爲有點常識的人，一定可以明瞭，此地不必多說。因此，在兩年以前，我就斷定和未必大亂。

在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堅確的認識之下，我和幾位朋友，就一面設法約人直接間接向蔣先生進言，一面設法傳佈我們的主張。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爲此事寫給蔣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爲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溥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裏，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漸漸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不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有天在富貴山大地地下室裏面辦公，熊天翼約我到一個祕密的房間，很嚴重的對我說道：「你要小心，不宜亂說話。廣西方面某要人，說你是非戰集團的主要人物。我謝謝天翼的好意，對他說：「中國人只知自愛，而不知愛國。如果我們認爲於國有利的主張，爲甚麼這樣愛惜羽毛，藏在心中而不說出呢？」

在當時，我們當然知道立即停止戰鬥行爲，不僅是不可能，而且是不應該。我們主張一面猛烈的抗戰，一面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這種線索，不僅不應斷絕，而且應該漸漸的加強，以便於適當時期，接洽停戰。同時，我們主張在堅強的軍事抵抗之外，不宜從別的方面，再給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實，使他們作爲擴大戰爭的理由。不幸我們所不願意的現象，繼續不斷的發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協定成

立了，蔣先生容共的談話發表了。前者給日本以刺激，後者投日本以口實，是毫無疑義的。當中俄協定公佈後的兩三天，某晚我聽見蔣先生的容共聲明，明天就要發表。我覺這兩件事，先後接着發表，實在是毫無好處。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請蔣先生稍緩發表，天翼也以爲然。湊巧蔣先生那晚約他談話，他就陳述這種意見，並蒙採納。但是只延遲了三天，結果，終於發表了。於是我深刻的認識了抗日勢必聯俄，聯俄必須容共的命運。因此更痛切的感覺，內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共黨，外有圖收漁人之利的蘇聯，戰事一定擴大，一定延長，而使中日雙方，兩敗俱傷，而爲他們的犧牲了。

羅斯福忽然在芝加哥發表了演說。這種空砲，在我們看起來，不僅於中國沒有好處，而且還有不利的結果。因爲一方面足以增加中國無知之徒的虛驕之氣，一方面更給共產黨及高調主義者以口實；同時實際的援助，却絲毫沒有得着。所以結果，適足以擴大中日的戰爭，而使之繼續。因此，羅斯福先生的用意，雖然和斯大林同志的不同，但其結果却是一樣！但是召集九國公約國會議的消息，忽然的傳播出來了。這却給我們低調俱樂部的同志以莫大的興奮。我們的根本見解，本來主張中日的關係，應由中日直接交涉來調整。九一八事變的根本錯誤，便在不直接交涉而委諸國聯。否則，事態決不致惡化到現在這個程度。所以這次事件，如果由九國會議來解決，無論日本不肯參加，就是參加，也一定得不到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但是慰情聊勝於無，也許比京會議，能開一個和平之門，爲中日兩國，造成直接交涉的機會和環境。同時，我們以爲美國一定和日本，事前有相當的接洽和諒解，決不致冒冒失失的隨便召集。因此，我們對於這個會，抱着相當的熱情和期待。萬想不到冒失的國家不單是中國。美國並未和日本有相當的接洽，更沒有相當的諒解，也沒有想到如果日本不參加，美國的面子，怎樣過得去，會議怎樣能下台。於是比京會議，就此無疾而終了。

金山衛登陸了，前線崩潰了，中央議決撤退南京了。我於十一月十九日晚奉命離京。二十日一早，於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之中，驅車到陵園，向陵墓遙拜告辭，再繞市街一週，含淚上船。所謂倉皇辭廟的悲慘情形，不圖親身經歷，也算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了。離京後一直回到長沙。父老相告：「傷兵遍地，無惡不作，將來日本軍隊還沒有來，我們恐怕在傷兵潰勇散匪的蹂躪之下，早已死無噍類了。」父老之言猶在耳，幾個月之後，真的日兵到來，而長沙已燒得精光了。

正在坐困愁城的時候，漢口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說是和局有望，要我立即到漢口。這却使我莫明其妙了。南京危在旦夕的時候，怎樣會和？難道日本當局，真和俾斯麥克一樣，屯兵城下，來和我們講和嗎？當晚打長途電話去問，才知道是陶德曼的調解。這中間的詳情，請讀者看汪先生「舉一個例」的論文。當時便立即擁擠上幾無隙地的火車，到了漢口。但是不到幾天，調解失敗了，南京陷落了，各線都崩潰了。那個時候的情形，現在實不忍回憶。

陶德曼第二次調解又來了。我們一般低調的同志，當然也相當的興奮，但是却沒有懷着多大的期待。後來居然失敗了。接着日本政府，就發表一月十六日的聲明。於是和平機運完全中斷了。

我們覺得世無不和之戰。英法若斷若續的打了一百年，結果還是個和。要說不和而結束的戰爭，歷史上當然也很多，最近的阿比西尼亞，就是一個例。我們當然不願學阿比西尼亞，那末，當然最後還是要講和了。即使中國能够最後勝利，至多也只能把日本軍隊，打出中國。我們要把日本當做阿比西尼亞，也是萬萬不可能的。然則結果還是要講和。「抗戰到底」——底是甚麼？底在那裏？如果不願談和，那何異說要「抗戰到死」呢？在這個基本認識之下，我們幾個同志，雖然力薄勢微，沒有方法挽回劫運，但是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道中間

慘淡經營的經過，現在沒有到公開的時期，只好留待將來了。

爲着振奮人心起見，召集了代表大會和全體會議。我於是實際上便擔負起中央宣傳部的責任了，這是我頂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却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於是我便想盡方法，向蔣先生辭職，拖了三個星期不去接事。結果未承蔣先生允許，只好勉強擔任，一天到晚的講鬼話，瞎吹牛了。這是我對不起人民的大罪惡。最痛苦的是每週的三種會議：一個是中宣部政治部和其他有關宣傳的各機關的宣傳會議，一個是召集外國記者的談話會，一個是本國記者的談話會。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長陳誠副部長周恩來廳長郭沫若。中宣部是我和董顯光蕭同茲。每次會議，聽着陳誠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論，眞使人啼笑皆非。聽着周恩來郭沫若等捏造事實，欺騙民衆的報告，眞使人切齒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針鋒相對的明白反對。所以我當時的宣傳方針，便提出科學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據理性，運用科學，去認清事實，不可爲盲目的感情所驅使。八月底到了重慶。在重慶的一個多月，大部份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對共產黨的鬥爭。當時歐洲風雲，非常緊急，於是重慶便發生了兩派議論：一派以爲歐戰一定發生，而且於中國有利，一派以爲歐戰不會發生，如果發生於中國不利。我們是主張第二種見解的。昏天黑地的孫科及其黨徒，鼓吹第一種議論。於是孫派對於宣傳部，雖然不敢明白的攻擊，却慢慢的開始反對了。歐戰是否發生，已有過去八九個月的事實證明，不必多說。但是就是現在，也還有許多人主張歐戰於中國有利，而希望大戰發生的。所以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話。在他們的意思，以爲英美法俄一條陣線和日德義一條陣線的戰爭，最初也許後者占優勢，但是他們都是窮國，經濟力決不及前者，所以最後的勝利，必屬於前者。我們中國，就可在這個世界戰爭中的總結算中，得到完全勝利。像這樣持之有

故，言之並不成理的論調，或可用來作無聊時的安慰，如果真正用做抗戰到底的根據，那實在太危險了。第一，假使這個推測，一點沒有錯誤，中國究竟能否支持到世界戰爭的總結算，不單是一個問題，而且可以說絕對不可能。支持到兩年，已經是意外了。以後海口全被封鎖，法幣日益跌落，武器的供給，壯丁的徵集，人心的渙散，沒有一件事，不比以前困難幾倍。歐戰甚麼時候發生，我們要等。發生之後，甚麼時候才到總結算，我們又要等。我們能支持到這樣的無窮期嗎？打算畫餅來充飢，結果，餅還沒有畫成，人早已餓死了。第二，美國是否參加，尤其是要緊的；日本是否參加，乃是決定要素。論者都是假定日美會參加一方的。這種假定，能否成立，乃是一個絕大的問題。美國前次參加了歐洲大戰，上了一個大當，至今大部份人猶引為恨。所以孤立派的力量，實際上可以支配政治。理想主義，固然是美國特長，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算盤終是要打的。既然上了一次當，那裏會再上第二次？至於日本，如果仔細的研究，參加歐戰，於他們是沒有好處的。至少在戰爭發生之初，他們是不會參戰的。在日本立場，一定應在有利的形勢之下，才去參加。所以日本如果永久不參加，則歐戰的誰勝誰負，決不致影響及中日戰爭。如果日本在有利的形勢之下參加，則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日德義。所以想從世界混戰的總結算中，去求中國的最後勝利，這個迷夢，實在可以醒了。

在重慶和共產黨徒及孫科等共產份子，在宣傳上和理論上奮鬥了一個多月，九月底又飛到漢口了。那個時候，武漢的景象，已非常蕭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間，召開慶祝雙十節的民衆大會。我當主席，我竟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好！勉強說幾分鐘違背良心的話，郭沫若忽然造個謠言，當衆報告司令部來電話，南灣正面大捷，殲滅了八千多敵人，還有萬多正在包圍中。於是羣衆跳躍狂呼。像這樣欺騙民衆的舉動，實在令人憤慨。但是當時我能當衆說出這是捏造的嗎？低調主義者，聽着高調，已經是心煩意亂，

還要跟着唱高調，我還能長久忍耐下去嗎？

天外飛來的消息：廣州失陷了。武漢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當這種嚴重的局面，一定要頒佈一個宣傳方針，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實在找不出甚麼理由，可以說話。要說武漢沒有軍事的價值，那末，以前爲甚麼要高唱保衛大武漢？要說敵人越深入，他們就越困難，那末，爲甚麼要抵抗，爲甚麼不就請他們深入呢？假使有個老百姓問我，鄙人忝爲宣傳部長，實在無詞以對。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找着陳博生商量，擬了一個宣傳方針。這個方針，我自己都不能相信，那裏能使別人相信呢？

武漢是十月廿五晚失陷的。我於廿四深夜昏黑之中，飛往成都，轉回重慶。不到幾天，長沙大火的消息又來了。當時苦悶，煩惱，和焦急的心境，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是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怎樣？沒有一個人不想和，沒有一個人敢說和。兩個人關着門說話，沒有不疾首痛心，咀咒戰爭，希望和平的。但是有了三四個人，調子就高起來了。大家都懷着這種心理，就是：和平是千真萬真，自己所希望，所企求的；但是頂好別人主和，自己主戰，換句話說，就是大家希望別人做漢奸，自己做民族英雄。而這些民族英雄，不僅希望有所謂漢奸出來，代替他們說他們想說的話，而且從心坎中希望所謂漢奸的主張趕快實現。像這樣人人想和，人人不敢言和，人人心裏希望別人言和，表面又要反對別人言和的可悲的矛盾現象，如果任他繼續下去，一定會把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命脈，斷送得乾乾淨淨！可惜這種現象，不僅重慶，成都，昆明，內地各地是這樣，就是現在上海租界之內，大部份還是這樣。國家到了這個情形，大家還是以個人爲本位，以自己爲前提，叫人怎麼不痛心呢？

前面曾經說過，自從八一三以後，我們無形之中，就以汪先生爲中心，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現在到了這種嚴重局面，我當然要去請教汪先生。當時汪先生痛憤尤多，感觸更深。對外說老實

話，共產黨徒固不待說，孫科之流也加以攻擊。一般同情的人，不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對。向蔣先生提出意見，始終沒有確實的結果。但是在重慶有甚麼辦法呢？所以汪先生以毅然決然的精神，決定爲國家爲民族，犧牲自己的一切，離開重慶，以便公開的發表和平主張，從事和平運動。我的主張既然和汪先生一樣，又爲汪先生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感動，所以也決心擺脫一切，追隨汪先生，爲國家民族，盡我應盡的責任了。

但是我的決心，是經過了一個月以上的考慮，有時甚至澈夜不能睡眠，然後才行決定的。家國的利益問題，我早已決定，因爲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國。所以這一點，不必重行考慮。個人的利害，更不成問題。既要打破環境，以開風氣之先，當然要犧牲個人的地位和名譽。所以這一點，也沒有費多大的考慮。最使我遲疑不決的，乃是情誼兩個字。第一，十幾年來，承蔣先生提攜裁成，纔得有今日。過去蔣先生決沒有對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脫離重慶，在我的居心，固然沒有絲毫反對他的意思，但是因爲主張不同，事實上不能不處於對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萬分難受的。第二，在黨部，政府，和軍隊之中，我的很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單音信難通，而且後會無期。這也是足以使我留戀的一大原因。這一個月的光陰，使我經歷有生以來未曾經過的痛苦，飽嘗人世間少有的煩悶。但是經過了極端的煩悶和痛苦，我仍決定犧牲私情和友誼，脫離環境，以努力主張的實現和貫徹。

我們的和平主張，怎樣纔能貫徹？換句話說，我們的計劃和步驟究竟怎樣？這當然是讀者所亟欲知道的。不過事關祕密，現在還沒到公開的時期。現在只是提出讀者的幾個疑問，一述個人的意見。

第一個疑問，便是條件問題。和平的條件，是否會使中國失去獨立，是否會使中國不能生存？這個疑問，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所必有而應有的。如果日本真想以外交方式及和平條約來妨礙中國的獨立與

生存，那末，汪先生和我們當然也要主張抗戰到底的。因為，既然戰亦亡，和亦亡，當然與其和而屈服的亡，不如戰而悲壯的亡，還可以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跡。但是不論日本居心如何，事實上他是不能滅亡中國的。既然不能，當然就要和。既然要和，當然應該提早，以免雙方多受戰爭的損失。有人或以爲抗戰越久，將來講和的條件，必於吾國越有利。如果吾們的抗戰形勢優勝，這個話是對的。像過去一樣的失城失地，恐怕抗戰越久，亡國越快，那裏還能希望有利的條件？

汪先生的豔電和近衛聲明中所述的各點，便是中日議和的根本原則。近衛聲明所述的各點，是不是亡國的條件？

不割地，不賠款，不駐兵，這能說是亡國的條件嗎？我們試把近衛聲明所提出的各點和二十六年十一月德大使陶德曼調解時所提出的各點（參看汪先生「舉一個例」一文）對照比較一下。除着近衛聲明中多一個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希望有居住及營業之自由，而日本可以放棄領事裁判權，甚至考慮交還租界以外，其餘各點，都是一樣。對於陶德曼所提出的各點，最高軍事幹部會議，既認爲不是亡國條件，（參看前舉一文）何以對於近衛聲明中所述各點，却說是足以使中國滅亡？我們再想一想時期。陶德曼的調解，是在南京沒有陷落之前。近衛聲明，是在去了南京，失了廣州，放棄了武漢，燒光了長沙以後。打仗打敗到這個程度，而議和的條件，比以前却没有很大的苛刻，爲甚麼當日可以接受和解，現在却反對進行交涉？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雜居，自然是陶德曼調解時所未曾提出的，能够打銷，當然希望打銷。但是日本如果放棄了領事裁判權，並且交還租界，那末內地雜居，也不會使中國滅亡。因爲日本既然放棄了領事裁判權，所有在華的日本人民，都要服從遵守中國的法律，我們可以國內法來管理他們，怎樣會使我們亡國？



根據上述，可見議和條件，決不是亡國的。如果我們有最後勝利的充分把握，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否則，抗戰到現在這樣的情形，還能夠得到這樣的條件，平心靜氣，也可以滿足。我們主和的人，良心上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了。

第二個疑問，便是沒有保障。有許多人以為日本沒有信義，如果直接交涉，一定會上當。因此，主張第三國居間調解，最好能在國際會議之中，解決中國糾紛，纔能夠得到保障。

這種顧慮和主張，都是對的，能夠這樣，誰不願意。但是中日直接交涉，乃是九一八以後日本的傳統政策，這個政策要他們取消，是不可能的。既然日本堅決主張直接交涉，我們是否僅僅因為交涉方式的問題，情願犧牲比較輕鬆的條件，情願抗戰到亡呢？我們只要是忠誠的謀國，當然情願得到較好的條件，而不願拘泥於交涉的形式的。

再進一步看，有沒有保障，全在我們自己如何的做法。我們自己有辦法，就有保障。如果自己毫無辦法，甚麼保障都是靠不住的。歐戰以後，英法對於德國的議和條件，是有充分的保障的，英法左手拿着凡爾賽條約，右手拿着國際聯盟，德國還能不規規矩矩的履行條約嗎？但是凡爾賽條約撕破了，保障在那裏？即就中國而論，九國公約，是保證中國的神聖條約。但是除掉在法理上主張不承認主義外，在事實上給中國以甚麼實際的保障？現在希望國際調解的，當然是希望英美法出面。他們都是九國公約簽字國，他們既然不能根據九國公約來保障，另開一種會議，新訂一種條約，就可以保障嗎？所以問題只在我們如何做，國際保障，也是靠不住的。

然則一點保障都沒有嗎？當然是有的。近衛聲明中的各點，是經過他們五相會議，內閣會議通過，再經御前會議，而公開發表於世界的。他們御前會議所決定的政策，是不容易變更的，此其一。他們既

然昭告世界，向中國所要求的條件，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我相信日本決不致這樣不講信義，將來再提出苛刻的條件，此其一。有了這兩重保障，我相信將來開始正式談判的時候，日本決不致於近衛聲明各點之外，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如果日本真正這樣不顧信義，那裏還能立國於世界。

第三。是日本的誠意問題。假定正式的和平條約，完全根據近衛聲明和發電而成立，日本是不是誠心誠意的來履行呢？這也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所必有而應有的顧慮。

我從各方探聽關於和平的意見，大約十分之九是贊成和平，而十分之九是懷疑日本的誠意的。他們的懷疑，是好意的。共產黨徒，因為要反對和平，所以惡意的宣傳日本沒有信義。一般人因為希望和平，所以恐怕日本沒有誠意。這種懷疑，足以供我們主和同志的參考，同時也可以促日本人士的反省。我常常聽見說，日本的話，說得很好聽，日本的聲明也說得極漂亮，但是實際上所做的事，完全不是這樣。口口聲聲所說的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事實上完全表現為壟斷。英美的經濟侵略，還替中國留下一點生機，像最近一年來，所表現的中日經濟合作，比幾十年來的英美經濟侵略，要厲害得多，幾乎不僅把肉吃光，連毛帶骨都要吃得乾乾淨淨，使中國沒有生存的餘地。我又常常聽見說日本內部的意見紛歧，派別複雜。東京所約定的事情，常遭當地軍人的反對；上級當局同意的事，下級機關可以不奉行。甚致在同一城中，城北甲機關所發的通行證，不為城南的乙機關所承認。這種情形，使平日對於日本有好感的人，也漸漸覺得毫無辦法，漸漸覺得憂慮和疑懼。這些感觸，都是根據事實，決不是憑空發生的。所以，不僅中國主和的同志，應該充分的注意，就是日本人士，也應該虛心坦懷的去檢閱。

這種疑懼的心理，和不合理的事實，我們當然盡量的告訴了日本朋友。我們表示如果這種疑懼的心理不消除，中日的真正親善，是沒有希望的。而消除這種疑懼，必須首先糾正種種不合理的事實。單憑

聲明，是絕對不夠的。十餘次愛護中國人民的聲明，他的効力會被城門口的日本士兵給中國人的一個耳光所抵銷。一百回尊重中國內政獨立的聲明，他的影響遠不及宣撫班長給縣長的一頓臭罵。諸如此類的事實，如果不切實糾正，不備一般人民不易消除反日的情緒，就是我們，也要回到重慶去抗戰。所以日本有無誠意，自然要看今後事實的表現，才能正確的判斷。

不過，據我個人幾個月來所接觸，所體驗，我深信日本現在的當局和有識的人士，是有誠意的。他們也痛恨日本奸商在中國的種種掠奪；他們也憤慨日本浪人在中國的不法行爲；他們也嘆息少數無知識的兵士的橫暴；他們也深感機關的複雜和事權的不統一。但是他們決心把這些過渡時期的必有現象，逐漸改良，而納入正軌。據說這半年來的情形，確較半年以前好得多。我以為只要日本當局和有識人士有着誠意，就可說日本有誠意，如果要日本全部人民，立即都沒有侵華侮華的思想和行動，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幾十年來，教育和政治的影響，決不能於短時期內完全改變。如果因為這種原因，便懷疑日本沒有誠意，那是不對的。反過來說，汪先生及我們一般同志，當然是誠心誠意的主張和日本提攜及合作的。但是我們能保證中國全國的人民，目前都沒有反日抗日的情緒和行動嗎？如果日本因為中國還有人反日抗日，便懷疑汪先生和我們沒有誠意，那不是天大的冤枉？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一部分的事實，便根本以為日本沒有誠意。

我常常對日本朋友說，中日兩國的國交調整，今後不是對外的問題，乃是對內的問題。就是日本對內如何管理其國民，使沒有侵華侮華的行爲，如何教育其國民使沒有侵華侮華的思想。中國則在對內如何管理其國民，使沒有反日抗日的行爲，如何教育其國民，使沒有反日抗日的思想。如果兩方面對內的政策和教育，都能成功，則兩國的真正親善就可實現，永久和平就可樹立。過去兩國都是責人而不責

己。中國說日本侵略，日本說中國反日，彼此互責，彼此互疑。今後我們都要改變態度。我們都要自責，而不責人，都要互信，而不互疑。這個道理，日本有識之士，是充分了解的。不過兩國對內，都有許多難關和許多癥結，我們應該分別努力去突破這些難關，去消除這些癥結！

我個人深信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現在確實是有誠意的。不過要使中國一般人相信起見，我很希望日本方面進一步以事實來證明。

根據上面所述，我們可知：第一，和平條件不是亡國條件；第二，條件的成立和履行，有相當的保障；第三，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在這三種情形之下，我們爲什麼不立即和平？爲什麼要抗戰到亡？爲什麼要學阿比西尼亞？同胞們！不要爲共產黨所劫持，不要爲重慶所威脅，不要爲一部淺薄無知的輿論所蒙蔽，我們要一致奮起，參加和平運動，促成和平實現，以保障國家的生存和民族的獨立！

原书空白页

# 揮淚辭「商務」

李聖五

自民國二十二年春接受商務印書館的聘約，主編東方雜誌，至二十八年春辭職，經過整整六個年頭。

東方雜誌於二十一年春，因社址焚燬，暫歸停刊。當我接辦時，正在復刊的第七個月，那個時期，我在政府裏擔任着職務，而且兼任中央日報的主筆，所以商務印書館當局，用極堅絕的意思來相邀，我也很誠懇地婉却。但因為我是商務印書館的舊同人，究竟抵不過他的盛意，從此就擔任了下來。每逢星期五日搭乘夜車到上海，星期日搭乘夜車回南京，星期六及星期日兩整天，將七天的編輯工作盡力趕完。這樣奔波忙碌的生活，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冬辭去政府的職務，才告一段落。

東方雜誌有四十幾年的歷史，是我國最老的定期刊物，它的聲名與內容，由我國百年以內的人文心血湊合而成。當我接任之初，感覺到它的遠大，及我個人的渺小，尤其商務印書館聽從我自行約請編輯及助手，使我更覺到責任重大。按照商務印書館用人的習慣，主編或因主張不合可以更選，一般的編輯及助手，是不能隨便進退的。因為我大部份時間，必須消耗在南京，也就用很迅速的方法，請到了四位編輯，兩位助手。四位編輯之中，一位政治學專家，一位經濟學教授，一位商務印書館老編輯，一位東方雜誌舊同事，其中兩位懂日文，一位懂法文，一位懂英文。東方雜誌社既經焚燬，我們就擇定了上海辣斐德路 偉達坊為臨時社址。

每月刊行兩期，每期登載十四萬言的東方雜誌，就由我們五個人開始編輯起來。每期內容目次，大致開端為東方論壇，是本社同人對於時事的批評；次為專門論著，是國內外專門學者的大作，文責由著

作人直接負擔；再則「現代史料」，接着「時事日誌」，最後爲「文藝」。這都是重要節目。至於「醫藥顧問」，軟性短文等，均散見於卷尾及補白之間。此外尚有東方畫報，起初每期僅有二頁，以後擴充到四頁，由四頁而八頁，由八頁而十六頁。一、因照片來源豐富；二、因日本及歐美各國的出名畫刊均在手邊；三、因負責編畫報的具有濃厚興趣。自民國二十四年起，東方畫報確引起許多讀者來信贊美，不過自二十五年下半年起，也增加了我很多的麻煩。

東方雜誌自創刊以來，除民國二十一年因不可抗力情形，間斷數月外，一共沒有停刊過。所以國內外讀書人，對於東方雜誌都很熟識。因此，海外凡有僑胞聚集的地方，都能看到它；在國土以內，它的勢力，不限於都市，鄉村中的小學教員却是它的最大訂戶。在領土這樣廣博，人口這樣衆多的中國，一個歷史最悠久的刊物，銷路的最多紀錄，雖然每期祇到五萬八千六百餘冊，但是傳播的範圍，幾乎遍及全世界。

編輯定期刊物，最要緊的須有各方面的作家源源投稿。當我接辦東方雜誌時，左派作家的勢力很大，上海許多小書店同第三國際密切合作。這般人認爲「東方雜誌」改組就是由他們手裏奪回來，交給一個在政府有職務的迂闊書生，因此對於文稿的來源，不能不作「未雨綢繆」的打算。商務印書館破例讓我自行尋找編輯及助手，想來也因為有同樣的顧慮。我請到那四位編輯，對於寫文章，個個是能手。我們約定在頭兩期每人每期，除分撰論壇及現代史料之外，再寫一篇五千到八千言的專著，另外再臨時找幾位熟朋友寫幾篇。第一個月的稿子來源，遂無問題。在這一個月的期間，凡上海方面非普羅派的出名作家，我們幾乎一一取得聯絡。平津滬粵漢等地的作家，分別去信徵稿。又因爲預期稿子來源枯竭，確定了自給的辦法。除由商務印書館代訂日本及歐美各國著名定期刊物九十七種，報章三十四種外，復

將商務印書館調來的中西圖書，及我們個人的藏書聚攏來，整個第三層樓變成了很有次序的圖書室，二樓是編輯所，樓下一層便爲事務處及接待室。

民國二十二年已開始醞釀制憲了，我們舉行第一次編輯會議的結論，便決定出一期「憲法專號」，還可以說是我主編「東方雜誌」的創刊號。決定以後，立刻就發出四十封徵稿的書信，如期惠稿的有二十一位，其中包括憲法學專家，教育文化及經濟各方面的學者，以至於政府方面的立法當局及立法委員等，再加上東方雜誌同人，分別撰述的稿子，結果這一期共計有三十八萬餘言之多，較平時幾增多三倍，實在出乎我的願望之外。

「憲法專號」刊行未及半月，我就變成左派作家的衆矢之的了。他們在上海出版的小型報紙上，幾乎天天提着我的名字來攻擊。彼時爲他們助威的一部份人，出版了一種「中學生」月刊，專就東方雜誌的內容來吹毛求疵。他們的小型報上指桑罵槐的毀謗語句，可謂淋漓盡致。但是我有我的信念，攻訐愈激烈，信念愈堅強，何況東方雜誌的同人都不反對我的主張，商務印書館當局及同人常常安慰我，南京一般喜歡寫散文的朋友，又常常謬加贊許。有這樣雄壯的後援，我爲什麼不可以合這些只知有我，不知有國的共產黨徒決鬥一下！

或問我的信念是什麼？簡單幾句話——我們文人，應當利用筆墨，小之對於國家民族，大之對於人類文化，作一些積極建設的工作。煽動，挑撥，毀謗，諷刺的文章，無論它的對象，是本國，是外國，是團體，是個人，都含有毒素，只等於負防衛國家的軍人或砲手，無緣無故的向善良人民射擊或轟炸。民國七八年間有一部份朋友，在北平藉着推翻數千年尊孔的學說，來引人注意，用以成名。當時我們親眼看見，無力拯救，但已斷言，這種舉動，僅僅造成幾位迎合民衆浮躁心理的名人，對於國家社會却種



下無限的禍害。還不是在兩三年以後，被共匪利用，製造了不信不義無禮無法的萬惡風氣，將整個的社會毀壞到不可收拾。共產黨徒是看得見的，這種風氣是看不見的而且摸不着的，但是國家的綱紀，社會的秩序，從此永遠樹植不起來了。我們如果深刻查考一下，試問在政府，以至各種社會團體方面，那一位負責的人不會感受到這種痛苦！有多少意志薄弱的人，爲這種洪流所激盪，甘趨墮落，泯滅良知，以致變成毀滅人羣社會的有力份子。這不過舉一個顯著的例子，類似的事蹟不必說了。我們既然擔著傳播最廣的東方雜誌，我們便不敢妄自菲薄。

當時我們一位同人是剛從海外留學回來的思想犀利的青年，他曾對我說，在日本的改造及中央公論等雜誌，在英國的 *Fortnightly*、在美國的 *Foreign Affairs* 等刊物，以及她們銷路最大的報章，各對政府抱一種贊助或建議態度，獨乎上海各大報，甚至於以往六個月的本雜誌，對政府大抵抱著一種懷疑或攻擊的態度，這真不應該！我聽了這段話，喜不自禁，迂闊的主編，竟請到迂闊的幫手，這也許是出於當年左派作家意料之外的罷！由此可知我個人的信念，就是東方雜誌同人的信念，我們頭腦之中，都粘貼著如何有助於造成富強國家，有秩序的社會，以及前進的文化等等箴銘。我們的能力雖極其棉薄，但是決不浪費它。這種淺陋的意見，在「憲法專號」的「讀者作者與編者」欄內，曾經詳細的寫出來。付刊以前，東方雜誌同人一一傳閱，都表同意，所以就成了我主編東方雜誌的編輯方針。

從此以後，東方雜誌的投稿人非但不減少，而且一天一天的增多起來。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讀閱來稿佔去我三分之二的時間，還律由編輯同人分別作個初步審查，然後再交我看。來稿既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得不割愛退還。每年我們又於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各出一期特大號，專請政府及各種社會團體之領導人物撰稿，爲樹立敬長尊賢的風氣。在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的特

大號上，我們預先徵請四十位領導人物撰寫自傳。當時黨國先進有七位惠稿，實業界，文化界，藝術界及宗教團體的領袖有十一位惠稿，汪先生的自傳刊列在卷首。那一期的特大號引起了社會上不少的好評，加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起，我既辭去政府的職務，商務印書館很誠懇的要我拿更多的時間，在館內擔任工作。除東方雜誌之外仍恢復我以前的總編輯職務，名義是編審委員，實際上計劃全盤的編輯計劃。我回到鄉里秘密的作了一個月的休息，就毅然決然接受了商務印書館這個較廣泛的聘約。對於東方雜誌仍抱既定方針，加倍努力。不幸時局推演到民國二十五年下半年以至二十六年上半年，那樣的緊張，共產黨的煽動力，已經搖撼了政府。此時東方雜誌早已撤回商務印書館去合署辦公，以我脆弱的能力，最多祇能維持東方雜誌同人的冷靜，那能感應同聚一廳的兩百餘文人的感情衝動，何況外來的勢力也在足以搖動人們的心弦。會記得二十五年春我寫了一篇「由戰爭到和平的階段」，刊行以後，有好幾位北大及南開的朋友寫信責備我，萬不應利用「東方」的權威為某方面辯護，這真冤枉死我的苦心。我只有覆信據理力爭，而且繼續撰述類似的文字。不久之後，我只寫了一篇「國際間幾個保僑名案」，不料剛剛出版，上海、浙、各報以及左傾的小型刊物就各在第一二版上轉載了。回頭看看這篇文章，雖是根據國際慣例，敘述事實，因為時間的關係，却含有相當刺激性，從那一次後，再沒寫這類的文章。

時局變化的結果，二十六年冬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及東方雜誌不得不離滬工作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就率領着各部門的編輯同人搭船經由香港，冒着轟炸，逕行遷往長沙南正路開始工作。留滬三月有奇，又不得不全體回港。以直到我辭去東方雜誌主編以前，幾乎每一期都有政府領導人物的大著，尤其汪先生的演講及撰述，幾乎每一篇我們都轉載。

到了二十八年一月，我料想商務印書館或不容許我在東方雜誌上主張和平。果然我第一篇試探性的文章，就被他們扣住，不予排印。他們勸我不發表的理由，可以說誠懇婉轉到萬分，但是我拿定主意非辭職不可了。意念既定，送去一封簡單的辭函，趕緊離開寓所。經商務當局的若干次到寓尋找，八九封來往信札，等到他最後一函，答應考慮准我辭職，我才回來同他會面。十數年的老朋友，尤其是年長的，十數年未分離的商務印書館，等到三小時懇切談話完了之後，不禁對流了幾點熱淚。在我離開香港以前，他們還堅約我作特約編輯！這是商務印書館從來不用的名稱，當時我想如果答應刊行我寫幾冊推勤和平的小冊子，我何嘗不可以對「特約編輯」名符其實呢？

回想我主編東方雜誌的經過，最切齒痛恨我的當然是共產黨，我也自承是共產黨的勁敵，不是共產黨的勁敵。在二十八年五月我離開香港到上海的前夜，還接到由內地寄到用土紙印的雙頁刊物，專攻擊我及另一位主和的同志。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速寫式的我們兩人的儼貌。在那雙頁的刊物上還攻擊到我主編的東方雜誌，我只有付之一笑了！

十幾年的編輯生活，使我深深感到腦筋的輸出太多，輸入太少。所以我近來除盡全力忠於職務以外，抽暇讀書，恢復學生時代的修養。同時感於「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真義，不敢輕率發表文字。此次承幾位朋友催促，匆匆撰此短文，疵謬必多，亟盼閱者多多指教。

翻譯者·崔玲等

出版者·新中國報社

上海河南路三〇八號

電話一五一四三

總發行·街燈書報社

南京建國書店

蘇州新國民書店

定價·每冊五元

出版期·卅一年一月十六日  
民國卅二年七月再版

